
已消失历史遗迹的价值认识、甄别方法 及再利用思路探讨 ——以武汉为例

罗巧灵 刘奇志 望开磊 丘永东¹

【提 要】每一座城市在不同的时期都会形成特有的标记，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更替，许多有价值的历史遗迹将可能逐渐消失。我国目前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中尚未涉及到已消失的历史遗迹，以武汉市江北片为例，对已消失历史遗迹价值的认识、甄别及再利用思路进行了探讨，主要包括：①分析世界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趋势，探讨已消失历史遗迹的保护意义；②根据“历史空间要素演化周期率”，界定该保护的已消失历史遗迹对象；③借鉴考古学的“文化层”概念，提出基于分层思想对已消失历史遗迹的甄别思路，即以文化为线索、时间为序列、空间为载体，通过对历史信息的分层解读，从点、线、面三个层面甄选有价值的已消失历史遗迹；④以汉阳近代工业片为例，探讨基于分层思想对已消失历史遗迹甄别的具体方法；⑤结合武汉工作实践，探索提出已消失历史遗迹的再利用思路。

【关键词】历史保护；已消失历史遗迹；分层思想；甄别；武汉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361/j.upf.201802013 **【文章编号】**1000-3363(2018)02-0106-07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每一座城市在不同的时期都会形成特有的信息，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更替，许多有价值的历史遗迹（以下简称：遗迹）将可能逐渐消失。已消失遗迹作为记录

作者简介

罗巧灵，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博士，副教授；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博士后，qiaolingluo@whu.edu.cn

刘奇志，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教授级高工

望开磊，武汉市规划研究院，主任工程师

丘永东，武汉市规划研究院，总工，教授级高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城市基本生态控制区保护性利用模式与策略研究（编号：71403196）

城市发展轨迹的重要标记，对城市空间形态、风貌及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我国目前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中尚未涉及已消失遗迹。武汉是国家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从1984年起，武汉市即开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实践，当前已基本完成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传统风貌街区——文保单位、优秀历史建筑”三个层次的资源普查及保护规划实践（刘奇志，等，2013）；为与规划管理相衔接，2012年，建立了《武汉市历史文化资源信息库》，将市域范围内16片街区及1054处文保单位、优秀历史建筑入库在此基础上，2015年，武汉市又将这1054处遗迹上线，建立面向公众开放的“城市记忆地图”公众信息平台。平台上线后公众反馈强烈，许多市民提出除现存的遗迹外，随着城市的时代更替及更新改造，大量曾经承载过历史文化的遗迹虽然已经消失，但其在城市的发展中留下了深深的文化印记，需要被铭记。为进一步留存城市记忆，2016年，武汉市以江北片（即武汉三镇中位于长江北岸的汉口、汉阳）为例，开展了已消失遗迹的规划保护试点工作。本文结合该工作，探讨对已消失遗迹的认识、甄别、保护及再利用的思路和方法。

1 已消失遗迹的保护意义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作为现代遗产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在《雅典宪章》中提出保护“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地区”开始，在国际遗产保护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张松，镇学峰，2011）。这些关注及保护实践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制定的一系列宪章、公约、建议和纲领性文件密不可分。由这些国际理论及规章可见（表1），随着人类对文化遗产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入，从单体建筑、历史街区、历史地段到历史城市及周围环境，从有形的物质空间环境到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文化景观，从现存历史遗存到所有的历史层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在不断扩大（董卫，2012；陈饶，董卫，2014；阳建强，2015）。我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国际发展趋势基本一致，从1956年国务院着手组织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1982年国务院转批国家建委等部门《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的通知》，到2017年新出台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征求意见稿），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渐从文物建筑保护转向整个历史城市及其历史环境和传统风貌的保护。

纵观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趋势，城市遗产不仅体现在表层上有形的物质空间形态，也包括无形的城市内部结构系统的有机生长和组织，以及其生活的环境与场所（阳建强，2015），尤其是历史性城市景观（HUL）方法提出对城市空间应从时间连续性的角度对空间连续性的价值进行甄别（Oers，周俭，2013），探讨其背后的形成机制是历史城市保护的关键。可见，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不是静态的保存物质形态，而应是动态的保护城市的生长过程（陈饶，董卫，2014）。在城市生长中，有些曾经在城市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建、构筑物虽然已经消失，但它对传统历史环境和风貌形成起到关键作用，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空间形态形成背后的原因和机制，同时也是记录城市发展轨迹的重要标记。如雄踞武昌蛇山之巅的黄鹤楼，最早建成于三国时期，历来是名传四海的游览圣地，由于兵火频繁，黄鹤楼屡建屡废、屡废屡建，但其一直对武汉市延续至今“龟蛇锁大江”的城市格局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当前国内外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的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注重尚存实体的遗存，并不包含那些曾经存在但目前已经消失的虚体物质遗存。因此，重新认识并保护已消失遗迹，由过去仅关注实体物质遗存向实体与虚体物质遗存并重转变，将对进一步完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理解城市空间生成机制，充分认识并延续城市文脉，具有重要意义。

表1 世界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典型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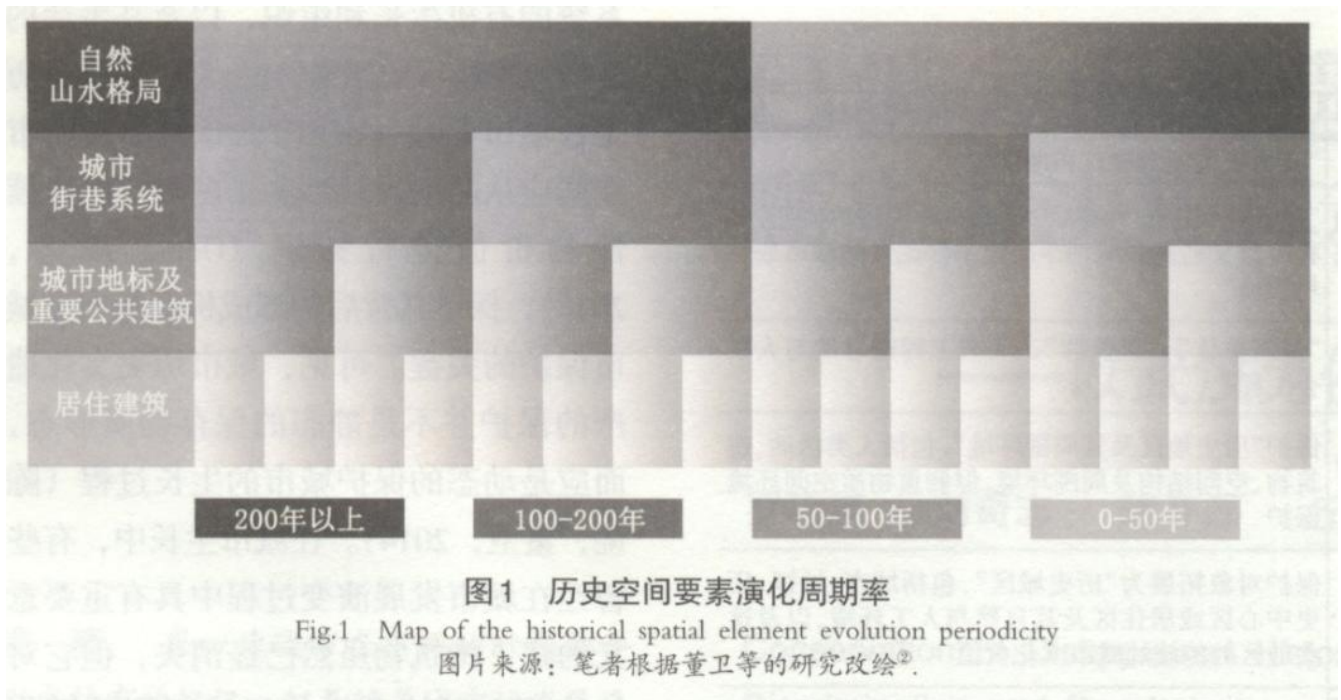
时间	发布组织	文件名称	有关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典型对象
1933年	国际现代建筑协会	《雅典宪章》	“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地区”
1964年	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	《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简称《威尼斯宪章》	“单体建筑”和“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
1972年	UNESCO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建筑单体”，“建筑群”，“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

1976 年	UNESCO	《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	保护“历史地区及其周围环境”，包括人类活动、建筑物、空间结构及周围环境，但侧重物质空间环境保护
1987 年	ICOMOS	《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简称《华盛顿宪章》	保护对象拓展为“历史城区”，包括城市、城镇、历史中心区或居住区及其自然与人工环境，以及这些地区的传统的城市文化价值
2003 年	UNESCO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与传统思想、民间工艺、地方习俗相关的文化遗产纳入国际文化遗产的保护范畴
2005 年	ICOMOS	《关于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周边环境保护的宣言》，简称《西安宣言》	将“遗产及其环境”由“物质空间”范畴拓展到“非物质文化环境”范畴，认为遗产的保护与其周边环境关系密切，二者构成一个地方性文化整体。
2011 年	ICOMOS	《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城镇和城市历史地段的瓦莱塔准则》	进一步拓展了“历史城镇与城市地区”概念，认为历史城镇和城市地区是由有形和无形要素共同构成。有形的物质要素：城镇内部与周边的城市结构、建筑元素、景观、全景、天际线、实现廊道和标志性场所；无形的非物质要素：由活动、象征性与历史性功能、文化实践、传统、记忆和文化参照物等构成其历史价值的物质
2011 年	UNESCO	《关于历史性城市景观的建议书》	一种遗产管理方法，将城市地区作为具有文化价值和自然价值的历史层积来理解，超越了“历史中心区”和“建筑群”范畴，包含更广阔的城市背景及它的地理环境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2 已消失遗迹对象的选择方法

历史上已消失的建、构筑物千千万万，其中哪些是需要保护和再利用的遗迹？笔者认为，保护对象应是已消失遗迹中那些在整个城市历史空间演进过程中发挥过关键作用的历史空间要素，包括自然、人工及人文环境。董卫教授在南京、苏州、杭州等城市的保护规划实践中提出历史空间要素演化周期率概念(图 1)，认为不同空间要素自有其内在的演化频率，周期较长的要素构成历史空间格局的结构体系，较短的要素则更多地反映出城市历史的时代特色。在城市历史空间演进中，自然山水格局最为稳固，奠定了城市的结构体系，如武汉市两江交汇、龟（山）蛇（山）锁大江的格局延续了上千年；其次为城市街巷系统，如一些古老的街道，虽然它的地层标高一直在涨，但是街道的走向及格局很长时间、甚至几千年都不变；再次为城市地标及重要公共建筑；变化最快的是分布最为广泛的居住建筑。



因此，基于历史空间要素演化周期率，自然山水格局相对稳固、居住建筑变化过快，笔者认为应考虑已消失遗迹是：

其一，历史街巷及网络体系。包括：①城市或区片的范围界限，如城墙、护城河、汉口租界等特色历史地区等；②城市的发展轴线，如汉阳旧城的西大街、显正街；③反映城市肌理的街巷，如汉正街“鱼骨状”街巷；④代表性的线状要素，如武汉第一条铁路“京汉铁路”，张之洞为治理水患、确保汉口安全所建的“张公堤”等。

其二，地标及重要的公共建、构筑物。国际上对“文化遗产”的界定标准为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建构筑物。已消失遗迹界定也应遵循这一标准，即历史上曾经存在，并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建、构筑物，包括：①在相应时期内具有稀缺性、唯一性，具备鲜明的时代特色或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如汉阳旧城的晴川书院、国际友好传道士兴办的圣高隆医院和教堂等；②当时在全国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如汉口老码头、汉正街的八大商会等；③有一定的时间跨度且在历史上形成完整的空间体系，能够从时间、空间上进行完整的解读，如汉口租界区的代表建、构筑物；④“最”字头，当时在全国同行业内具有代表性或先进性，如产量最多、质量最高、品牌影响最大、工艺最先进的工业遗迹。

3 已消失遗迹的甄别思路

甄别并对已消失遗迹进行相对准确的定位，是关键，也是难点。已消失遗迹由于无实物可循，传统的实地踏勘、现场走访等普查方法已难以适用。尤其经过漫长的时间演变，同一地域空间承载了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多个事件，各种历史信息相互交错、前后叠加浑成一团，给后人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造成困难（刘奔腾，董卫，2008）。因此，如何将浩瀚繁杂无序的历史信息，按照一定的关系，抽象成具体的空间实体要素，并对应到当前的城市空间上，是城市已消失遗迹甄别及保护首先需要理清的关系。

城市是具有文化价值和自然价值的历史层积（historic layering）（张松，镇学峰，2011），考古学中有一术语——“文化层”，即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痕迹、遗物和有机物所形成的堆积层。“文化层”其实包含有文化时间概念，每一层代表一定的时期，可通过不同阶段文化层的比较，看出一个群体文化模式发展和演变的时间序列。与“文化层”概念类似，东南大学董卫教授团队在明孝陵神道南段保护规划中提出以分层思想为指导的历史地段保护方法，即通过对历史信息进行分层和解读，

探讨历史信息与物质空间对应的整合措施。借鉴“文化层”及“分层思想”，本文提出已消失遗迹的甄别思路是：以文化为线索、时间为序列、空间为载体，通过对历史信息的分层解读，梳理文化特征，找出影响和代表城市发展阶段的关键节点，还原到空间载体，从中找到时空的对应关系。该思路综合传统历史研究“文化-时间”、“文化-空间”的二维研究路径，将“文化-时间-空间”进行三维一体化研究。具体讲：

其一，文化为线索：对浩瀚的历史信息进行解读，提取城市发展历程中不同阶段典型的文化特征，将其划分成若干个历史文化层，每一层的划分都有区别于其他层次的文化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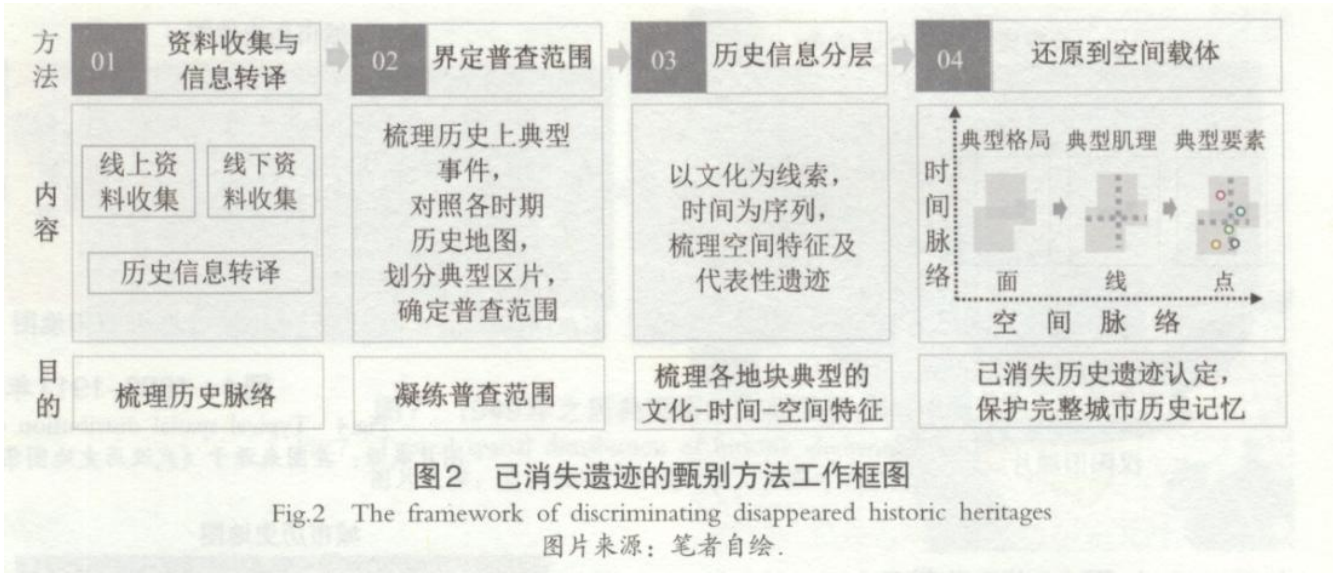
其二，时间为序列：按照时间顺序，根据每个历史文化层的“包含物”展现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事件，使得历史文化层与各个时期的历史信息一一对应，变繁杂的空间为有序的空间。

其三，空间为载体：将不同时间段的文化要素固化到相应空间，整合为历史空间要素，使得文化、时间、空间一一对应。

要真正做到三维一体化研究，仅从技术方面入手还不够，由于我国近代制图落后于西方，大量老地图只反映各信息点的相对空间关系，这对从“读图”来进行已消失遗迹的定位会产生一定困难，只能通过老地图识别关键要素，需再通过考察、走访的方式进行位置界定，并借助“城市记忆地图”等线上公众参与的方式，对空间定位起一定的校核。

4 已消失遗迹的甄别方法

要甄别已消失遗迹，应重点从四个方面入手：首先通过阅读历史文献、历史地图，对城市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其次，要根据所收集及整理的资料，凝练普查的范围；然后，再对历史信息进行分层，梳理各地块的典型文化特征，找到文化-时间-空间的对应关系；最后将代表性遗迹落实到当今的城市空间上(图 2)。本节以武汉为例，具体阐述已消失遗迹的甄别方法。



4.1 资料收集与信息转译

线上线下资料收集：线下主要收集武汉市历史文献、地图、书籍等资料及武汉市各层面 20 余项历史保护规划，并现场实地调研、访谈。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传统资料收集方式面临变革。此次已消失遗迹普查在传统线下收集的基础上，又引入线上收集方式，借助已上线的“城市记忆地图”让公众在公共信息平台上上传历史老照片、历史故事、历史评述，点出已消失遗迹大致位

置及名称，这也有助于促进众筹武汉记忆。

信息转译：通过阅读相关文史资料，将古代城市地图中看似繁杂无序的信息，抽象成具体的空间实体要素，用规划的思维将信息对应到当前的空间中(刘奔腾，董卫，2008;李建，董卫，2008)。如张之洞督鄂时期在汉阳大办工业，在汉江南岸形成十里工业长廊，但具体有哪些工业企业、空间范围如何、如何发展、演变？在现代的地图上并未有明确的记载，转译则是对这些历史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再将已消失的工业遗迹在现代城市空间上一一落位。

4.2 普查范围界定

凝练普查范围的前提是理清武汉市发展历程及空间分布。项目组对武汉市各时期历史文献、地图、书籍、相关规划等资料进行了全面收集及系统梳理，概括的结果是在武汉市江北片，有四个代表性阶段及事件对城市空间格局形成具有重要影响：①汉阳、武昌双镇并举：从东汉末年到明洪武时期的1400多年，均只有汉阳、武昌两城，虽几经兴废，但一直呈现双城并举的局面；②三镇鼎立：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口由此而生，“汉正街”名扬天下，汉阳、武昌、汉口三镇鼎立格局由此形成；③汉口开埠：自1861年，紧邻汉口老城，沿长江向北，英、法、俄、德、日五国租界相继形成，武汉近代史真正开始，码头繁荣，汉口逐渐成为“东方芝加哥”；④近代工业：自1889年张之洞督鄂开始，在洋务运动浪潮的推动下，在汉江南岸大办工业，形成“十里工业长廊”，促使武汉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根据以上四大重要事件，对照各时期武汉历史地图，确定普查范围如图3所示，并将其分为汉口租界片、汉正街片、汉阳近代工业片及汉阳旧城片。



图3 普查范围图

Fig.3 The map of the general survey boundary

图片来源：笔者自绘。

4.3 基于文化线索和时间序列的历史信息分层

由于四片的发展脉络及文化特征各不相同，下文以汉阳近代工业片为例，阐述信息分层及还原到空间载体的方法。

汉阳近代工业片是张之洞督鄂时，在洋务运动推动下，在武汉兴办的工业基地。近代工业文化是该区域的主导文化，以工业的兴衰为线索，基于时间序列，可将其分为四个层次（表 2），具体如下：

表 2 汉阳近代工业片历史信息分层一览表

	分层一	分层二	分层三	分层四
文化线索	近代工业文化	近代工业文化战争文化	近代工业文化战争文化	现代工业文化现代文化产业
时间序列	1889-1911 年	1912-1924 年	1925-1949 年	1949 年之后
典型事件	1889 年，张之洞督鄂，大办工业； 1908 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组成汉冶萍钢铁厂矿有限公司，是亚洲规模最大的近代钢铁联合企业； 1911 年，打响辛亥首义的第一枪，由湖北枪炮厂生产	1912 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 1914 年正式改为汉阳兵工厂； 1917 年汉阳钢厂并入汉阳兵工厂； 1917 年，上海制造局 138 台机器全部拨交汉阳兵工厂	1925 年，汉阳铁厂停产； 1937 年，汉阳铁厂设备迁至重庆；1938 年，汉阳兵工厂迁至湖南；1946 年，汉阳兵工厂撤销	1958 年汉阳钢厂成立； 2007 年，琴台大剧院建成，汉阳钢厂迁出、原址建张之洞博物馆； 2009 年，琴台音乐厅落成，“汉阳造”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
空间布局	沿汉江南岸形成“十里工业长廊”	在清末基础上向南扩展；增建长江沿岸码头，汉江长江共同运输；内部增加铁路	战争导致工业区内几乎成为一片空地。厂内铁路毁坏，内部交通几近瘫痪	形成近代工业文化、月湖文化、龟山红色文化三大片区
代表性遗迹	湖北枪炮厂、汉阳铁厂、湖北官砖厂、周恒顺机器厂	汉阳铁厂生铁厂、熟铁厂、打铁厂、铁厂码头等；汉阳兵工厂洋匠房、锅炉厂、枪弹厂等	汉阳铁厂化铁炉旧址、汉阳铁厂打铁厂旧址、汉阳兵工厂锅炉厂旧址、汉阳兵工厂竣货厂旧址	武汉鹦鹉磁带厂、武汉钢铁厂、张之洞博物馆、琴台音乐厅、琴台大剧院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4.3.1 清末汉阳近代工业片的建成(1889—1911 年)

1889 年，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督鄂，在武汉大办实业，先后在汉阳汉江南岸创办了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后改名为汉阳兵工厂）等一系列工业企业，数十家工业厂房沿汉江南岸一字排开，形成“十里工业长廊”，蔚为壮观。汉阳铁厂是亚洲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新式钢铁联合企业。湖北枪炮厂为中国第一家规模最大的近代转业兵工厂，以国内军火工厂中最先进的设备生产的步枪称为“汉阳造”。在铁厂和枪炮厂建设期间，配套兴建了砖厂、无烟火药局等，以及生产民用产品为主的湖北针钉厂等。官办工业的发展带动民营工业的兴起，其中周恒顺机器厂是湖北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民营机械厂。清末，汉阳已形成冶金、兵器、机械、建材、农产品加工五大制造业基地。工业区内部，主干道顺汉江东西向布局，建筑与厂房南北向设置，对外交通运输走水路，沿汉江布置码头。张之洞督办的近代工业区奠定了汉江南岸的基本格局，武汉现代工业由此发端。结合该时期历史地图，整理典型历史空间要素如图 4。



4.3.2 民国前期汉阳近代工业片的快速发展（1912—1924年）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自此，中国进入军阀混战时期，与战争密切相关的钢铁与兵工产业顺势蓬勃起来，汉阳近代工业片进入了短暂的“黄金时代”。在清末原有格局基础上，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等几大工厂均有扩建。汉阳铁厂生产的铁和钢 1894 年至 1911 年均为全国总产量的 100%，到 1924 年停产前的 31 年中，共产铁 250 万 t、钢 55 万 t。1912 年，北洋政府拨款修整在辛亥革命中损坏的汉阳兵工厂厂房，10 月全面复工；1917 年，上海制造局停造步枪，138 台机器全部拨交汉阳兵工厂，其步枪生产能力增至日产 100 支。民营企业方面，原来以人力、畜力为动力的手工作坊纷纷采用机器生产，并以蒸汽机、柴油机、煤气机为动力，实现从手工作坊向近代工厂的过渡。当时，汉阳民营工业形成机器制造、砖瓦建材、粮油加工等三大行业。在工业区内部，修建铁路，道路系统更为完善；在工业区外部，沿长江建设码头，突破了原有汉江码头的限制，对外交通更为便利。结合该时期历史地图，整理典型历史空间要素如图 5。



4.3.3 民国中后期一代雄厂的易址与衰落（1925—1949年）

1925 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经历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系列战争后，工业区内工厂几经沉浮，发展几乎停滞。1925 年，汉阳铁厂全部停产；在工厂纷纷内迁的浪潮中，1937 年 11 月汉阳铁厂迁往重庆大渡口。1926 年 9 月，国民革命

军攻克汉阳，结束了北洋军阀对汉阳兵工厂的控制，改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辖；1932 年枪弹厂迁往河南省巩县兵工厂，但因厂房问题无法解决，后又迁回原厂；1938 年，汉阳兵工厂迁至湖南；1943 年 10 月，利用生产“汉阳造”的机器，批量生产中正式步枪，直至 1944 年完全停产；1946 年，汉阳兵工厂奉令撤销。至此，一代雄厂不复存在。到解放初期，汉阳兵工厂与汉阳铁厂仅剩几栋厂房，厂内铁路毁坏。结合该时期历史地图，整理典型历史空间要素如图 6。



4.3.4 解放后汉阳近代工业片的功能更替（1949—至今）

解放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汉阳近代工业片也布局了部分企业。1958 年成立汉阳钢厂，1961 年，番号“824”的原军工企业武汉鸚鵡磁帶厂迁入，在原汉阳兵工厂处建厂。之后，汉阳近代工业片发展沉寂。随着旧城改造及城市更新，2007 年，武钢集团将汉阳钢厂迁至阳逻开发区，原址建成为张之洞近代工业博物馆。2007 年，武汉市政府在月湖之畔、江汉之滨建成武汉最大规模的文化设施——琴台大剧院，2009 年琴台音乐厅又在其旁落成，原武汉鸚鵡磁帶厂改造为“汉阳造”文化创意产业园。至此，除改造后的“汉阳造”还见证着曾经工业的印记，传统工业区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汉阳近代工业片形成近代工业文化、月湖文化、龟山文化三大片区^⑧。结合该时期地图，整理典型历史空间要素如图 7。



4.4 还原到空间载体

根据历史信息分层，将不同分层的代表性遗迹整合叠加，固化到相应空间上，会出现一些现存遗迹与已消失遗迹相重叠，笔者以本文确定的已消失遗迹保护对象，对叠加后重叠部分按照该遗迹在整个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为依据，甄别优选出武汉市汉阳近代工业片已消失遗迹。具体包括：

其一，面：梳理出了最具代表性的12处工厂的具体范围，包括：①张之洞时期“十里工业长廊”中的代表性企业，如无烟药局、钢药厂、汉阳针钉厂、汉阳兵工厂、汉阳铁厂等；②最突出的民营企业，如周本顺机械厂、永昌原油厂等；③“一五”时期布局的汉阳钢厂。

其二，线：汉阳近代工业片缺乏特色的线要素，故未列入；

其三，点：本次共甄别汉阳近代工业片消失遗迹59处，类型涉及工厂厂房、码头等。其中汉阳兵工厂14处，包括汉阳兵工厂的码头、洋匠房、炮药厂、炮厂、煤气厂、铸弹厂、枪弹厂、堆煤处、打铁厂等；汉阳铁厂26处，包括民国汉阳铁厂的码头、打铁厂、办公用房，清末汉阳铁厂的码头、钩钉厂、修理厂等。其他消失遗迹5处，包括当时最大的民营企业周恒顺机器厂、大庆轮船公司、清末武圣厂码头、清末武圣厂旧址、“二五”时期的鹤鹑磁带厂。

5 已消失遗迹的再利用思路探索

基于以上方法，此次武汉市江北片已消失遗迹普查，共甄别出特色区域21个、已消失遗迹147处。我们将汉口五大租界的范围、汉正街演进的范围、汉阳旧城城墙的范围、汉口的护城河、汉口堡城墙、曾经辉煌的京汉铁路线、汉阳旧城的县署、衙署、贡院、汉正街历史上享有盛誉的八大商会、八大会馆等要素都在空间上一一落位，从而形成了解读武汉发展历程的脉络。

甄别已消失遗迹是基础，甄别之后如何展示及再利用则是关键。我们结合工作实践及思考，进行了以下探索：

其一，纳入法定规划体系，作为城市规划管理与审批的参考。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控规）是规划管理的直接依据，武汉市控规分法定文件和指导文件两个部分，法定文件包括“五线”及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等内容，“五线”中的“紫线”即为历史保护法定线，对现存遗迹的本体线、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均采用“实线”方式进行强制性保护；其他有关历史保护的内容则列入引导性文件。针对已消失遗迹的保护及再利用，我们建议与控规图则在规划范围、管制方式上完全对接，一方面将已消失遗迹的点、线、面三要素纳入紫线管理范畴，当然是以“虚线”控制的方式，列为非强制性内容，作为方案审批的参照；另一方面在控规引导性文件中，增加已消失遗迹信息，包括区位、年代、历史特征等，鼓励规划管理及设计人员积极参与历史文脉保护，并通过历史和空间的梳理，创造出新的有历史文化背景的城市空间。此外，进一步扩充《武汉市历史文化资源信息库》，将已消失遗迹信息入库，与规划管理一张图无缝衔接。

其二，强化“城市记忆地图”公众信息平台，通过实时查询、反馈、更新等方式为公众参与历史保护提供便利的渠道。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的责任，更应是所有公众共同的义务。由于缺乏相应的渠道，有关城市历史演变和城市历史价值的信息难以有效地传递给设计人员、开发商、政府管理人员及市民，使得文脉的延续以及规划设计的思路均大打折扣。充分利用好“城市记忆地图”公众信息平台，则可弥补这一不足：对本地民众，可汇聚武汉市民的历史记忆，提升大众历史保护的意识；对外来人员，通过系统展示城市的历史文化，可提升城市魅力，增添旅游新风尚；对相关研究或兴趣人员，可提供空间分析、实物考证、设计参考的信息平台；对专业设计及管理人員，可在其城市规划、城市设计与景观设计中，融入城市区域发展脉络与城市记忆，创造更具历史文化意义和场所感的城市空间。

其三，探索多样化展示及利用方式，再现城市记忆。主要是：①原地复原：对形成城市格局具有标识作用的已消失遗迹，

可采取原地复原的方式，且修复和补缺的部分必须与现存部分形成整体，保持景观的和谐，如武汉地标“黄鹤楼”在1985年根据历史文献原址复建；②原地标识：对孤立的、已消失但有历史意义的遗迹点，可进行原地设立标识，以保护和增强历史记忆；③博物馆模式：对已消失遗迹，可结合有关主题将相关历史资料放入博物馆进行展览；④城市记忆线路模式：针对部分有完整历史脉络的区域，可整合已消失遗迹与现存遗迹，打造独具特色的城市记忆线路。如可与武汉旅游APP合作，加入武汉城市遗产及记忆板块，针对不同的城市风貌区域，策划不同主题线路，如汉阳古城体验、武汉近代工业、民国风情体验、近代租界等，保护和延续城市文脉。

6 结语

已消失遗迹的甄别、展示与再利用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我们在充分认识到已消失遗迹也具有价值的基础上，进行了已消失遗迹的对象界定；然后借鉴考古学的“文化层”概念，提出了已消失遗迹的甄别思路，主要是根据历史空间要素演化周期，以文化为线索、时间为序列、空间为载体，通过对历史信息的分层解读，找出影响城市发展的关键要素，找到文化、时间、空间三维的对应关系，进而甄别已消失遗迹；并尝试性地结合规划管理及系统建设、社会认识和宣传、以及多样化展示及利用等方式提出已消失遗迹的后续展示及再利用思路，希望能有助于完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理论与实践体系。

注 释

① 现状信息有：区位、建造年代、建筑风格、建造时间、现名称、公布日期、保护类别、保护级别等。规划信息有：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范围、控制地带、紫线范围、保护要求、保护措施。

② 2008年9月4日，董卫教授应邀赴武汉市国土规划局讲座，题为《历史环境中的城市设计方法研究》。在该讲座中，董卫教授在介绍南京历史保护案例时提到“历史空间要素演化周期率”概念，笔者据此进行改绘。讲座链接如下：
<http://gt-ghj.wuhan.gov.cn/pc-260-18039.html>

③ 近代工业文化区，龟山以北、鹦鹉大道以东、汉江以南，以原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现“汉阳造”为代表的区域；月湖文化区：鹦鹉大道以西，琴台大道以北，汉江以南，环月湖以现琴台大剧院、琴台音乐厅为代表的区域；龟山文化区：龟山是武汉市“龟（山）蛇（山）锁大江”城市意向的代表元素，龟山上遗留有三国时期的鲁肃墓、关（羽）王庙、洗马洞、磨刀石、磨崖石刻，辛亥革命领袖黄兴铜像，抗日战争时期的向警予烈士陵园和红色战士公墓等几十处文化遗迹，形成龟山文化区。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Oers R. V., 周俭. 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建议书》在亚太地区的实施[J]. 研究前沿, 2013(7): 9-12. (VAN OERS R, ZHOU Jian.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11 UNESCO “Recommendation on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J]. Research Frontier, 2013(7): 9-12.)

[2] 陈饶, 董卫. 基于历史地图的城市历史环境保护研究[J]. 现代城市研究, 2014(2): 64-71. (CHEN Rao, DONG Wei. Study on the conservation of city historic environment based on historical maps[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4(2): 64-71.)

[3] 董卫. 城市历史环境保护与整治的梯度方法[J]. 北京规划建设, 2012(6): 34-37. (DONG Wei. The gradient method for urban historical environment conserv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J]. Beijing Planning Review, 2012(6): 34-37.)

[4] 李建, 董卫. 古代城市地图转译的历史空间整合方法——以杭州市古代城市地图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08(2): 93-98.

(LI Jian, DONG Wei. An integrated research approach on city map decoding based on reshaping decoding of ancient map of Hangzhou City [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8(2): 93—98.)

[5] 刘奔腾, 董卫. 基于分层思想的历史地段保护方法探讨——以明孝陵神道南段保护规划为例[J]. 规划师, 2008, 24(10): 19-23. (LIU Benteng, DONG Wei. Discussion about historic site preservation planning method base on hierarchy concept: a case study of the Xiaoling Mausoleum Sacred Way preservation planning[J]. Planners, 2008(10): 19-23.)

[6] 刘奇志, 罗巧灵. 武汉市历史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规划实践探索[J]. 城市规划学刊, 2013(5): 94-99. (LIU Qizhi, LUO Qiaoling. Practices on the dynamic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s in Wuhan[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3(5): 94—99.)

[7] 阳建强. 城市历史环境和传统风貌的保护[J]. 上海城市规划, 2015(5): 18-22. (YANG Jianqiang. Protection of urban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traditional style[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5(5): 18-22.)

[8] 张松, 镇学峰. 历史性城市景观——一条通向城市保护的新路径[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2(3): 29-34. (ZHANG Song, ZHEN Xuefeng.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a new approach to urban conservation[J]. Journal of Tongj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ction), 2011(3): 29-34.)